

Ai Siqi' Contribution to the Loc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Bo Feng¹, Jingjing Guo²

¹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²Ideological &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Department,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Email: bgzirui@yahoo.com.cn, bisuguoqing@126.com

Received: Sep. 14th, 2012; revised: Oct. 12th, 2012; accepted: Oct. 20th, 2012

Abstract: Ai Siqi, an explorer, practitioner and inaugurator of the loc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devoted himself to studying and propagating Marxist philosophy, consistently applied Marxist philosophy in solving China's practical problems, achieved a series of localized Marxist philosophy results, all of these laid his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This article made full use of the relevant documents and try to sort out the philosophical contributions of Ai Siqi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well as an in-depth study of his status and contributions in the process of the loc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By reviewing Ai Siqi's work and contributions, we could find out the meaning of enlightenments for further practicing the loc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Nowadays, Energetic efforts have been making to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While commemorating Ai Siqi and studying his wor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integrate theories with practices, so as to provide creative theoretical fruits for developing scientific system of the theory during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Ai Siqi; Marxist Philosophy; Localization; Popularization; Contribution

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贡献

冯 波¹, 郭晶婧²

¹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 北京

²中国传媒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 北京

Email: bgzirui@yahoo.com.cn, bisuguoqing@126.com

收稿日期: 2012年9月14日; 修回日期: 2012年10月12日; 录用日期: 2012年10月20日

摘 要: 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探索者、实践者与开创者。他笃信力行, 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 坚持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说明中国的实际问题, 完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 奠定了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发展史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历程中的地位。本文充分利用了相关文献, 力图对艾思奇 1949 年前的哲学贡献进行梳理, 对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中的地位、贡献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重温这些贡献, 对于当代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启迪意义。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今天, 纪念和研究艾思奇, 最重要的就是付诸行动, 切实做好理论联系当代中国实际的工作, 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提供创新性理论成果。

关键词: 艾思奇;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 大众化; 贡献

1. 引言

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责无旁贷的使命，它关系到我党的理论建设水平和能力，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时代化是从时间角度强调马克思主义要结合时代特点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侧重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使马克思主义以通俗的方式走进群众的心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可分割，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中国化是核心，时代化是关键，大众化是基础。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借鉴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遗产是非常必要的。

艾思奇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用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这集中体现在他 1949 年前所著《大众哲学》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倡等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中。

2.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其意义

《大众哲学》是艾思奇在上海时期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也是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所做的主要贡献之一。

2.1. 《大众哲学》产生的背景、条件

《大众哲学》产生于二十世纪 30 年代中期。那时的当政者对红色根据地发动了“围剿”，对人民实行镇压，加上连年内战、天灾、经济破产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山河破碎，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于是，民族的出路，个人的出路在在哪里的问题成为人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许多人，特别是失学、失业的青年，纷纷给艾思奇所在的“读书指导部”写信，要求解答这些问题。艾思奇仿佛看到无数双迷惘的眼睛在期待着、探求着。他痛切地感到这时期弥漫在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中的时代苦闷，是由于没有

正确的世界观。因此，使更多的人把握正确的认识武器，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正确的生活道路，是理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面对广大人民大众，其中不少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工人、失业者，是需要一番哲学通俗化的工作才能把正确的思想武器交到他们手里的，艾思奇说过：“我们这个国家，能有机会受教育的人不多，特别是广大贫苦人民。我们写文章，做工作，一定要把这些人当作我们的对象^[1]。”所以，为大众写通俗哲学是时代和人民的必然要求。

艾思奇深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和人民提出的历史课题的最好解答。“中国的有着无限的将来的哲学思潮是在 1927 年后影响了全思想界的唯物辩证法思潮出现时才显露头角”。“唯物辩证法哲学的锋芒的真理使被压迫者的前进之势成为锐不可当”^[2]。艾思奇认为，唯物辩证法哲学与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要求相一致，是最有前途的哲学，它能够了作为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人们来对待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有坚定的信仰，而且有较全面的理解和掌握，这是他在日本刻苦攻读马列著作的结果。凭借这种信仰，理解和对通俗化之迫切的认识，艾思奇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中第一部通俗化的著作。

《大众哲学》产生以前，已经有“文艺大众化”、“社会科学大众化”、“科学大众化”的口号和作品出现。但“哲学的大众化”的口号还没有提出来过，一般的看法都是认为哲学是玄妙高深的学问，与通俗化无缘。当时很多人不屑于哲学通俗化的尝试，认为把高深的哲学通俗化会使哲学流于庸俗，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艾思奇不受这些流行偏见的限制，毅然担当起了哲学通俗化的任务，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2.2. 《大众哲学》的特点

《大众哲学》最大的特点是深入浅出，以通俗化的写作手法表达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内容。

《大众哲学》分四章，第一章绪论，讲哲学的对象和任务，指出哲学是人们对于世界的根本认识和根本态度，是最普遍的最一般的知识，哲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它能改变世界。第二章讲本体论问题，划分了哲学上的物质的区别。第三章讲认识论，论述了感性认识和更改认识的矛盾、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哲学上的党派

性原则，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等问题。第四章讲方法论，实际上讲的是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和内因与外因、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规律与因果性、必须性和偶然性、目的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等范畴。可见，《大众哲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

《大众哲学》对唯物辩证法内容的通俗化的表述的特点表现在：首先，它紧密联系现实生活，时刻注意用具体整合来通俗地解释哲学理论，有的整合还多次重复，以适应读者的接受能力及连载之连贯性的需要，例如用卓别林和希特勒分别说明，同是卓别林的形象，但一个是喜剧大师一个却是独裁暴君。而喜剧有大师好几个，他们相貌上不同，但在理性认识上却是相同的。这就表明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有差别的。又如，孙悟空七十二变说明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差别和联系，用牛角尖的比喻说明哲学上的物质与科学的物质的区别等等。在阐述每一个哲学原理时，艾思奇都能把这些原理寓于人们熟悉的、具体生动的实际事例中，从这些事例中引申出一般人看来很是抽象的哲学道理。其次，《大众哲学》在篇目标题的选定上，用了人们感兴趣的新颖鲜明的标题。例如：“由胡桃说起”指从吃胡桃引出实践和哲学的党派性；“天晓得”的标题下讲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问题；“追论雷峰塔的倒塌”引起的是“质量互变规律”；“在劫者难逃”引出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引出目的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关系问题。这些题目篇篇引人入胜，使读者兴趣盎然又豁然开朗。第三，在语言上《大众哲学》采用了通俗的口语化的语言形式，它侃侃道来，没有冗长、费解的句子，像拉家常一样，让人感到亲切、容易明白。这种表达方法比其他哲学书籍更接近于老百姓的语言风格，容易为各阶层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李公朴先生在为《哲学讲话》(后改名为《大众哲学》)所作的序中说：“这本书用最通俗的循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力气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还是仅有的贡献^[3]。”这段话是对《大众哲学》特点为的最好的概括。

2.3. 《大众哲学》的理论价值

《大众哲学》不只是一本通俗的普及唯物辩证法

的著作，而且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方面也是有贡献的，李公朴先生指出：“作者对新哲学中的许多问题有时解释的比其它的著作更明确。虽然是通俗化的著作，但也有许多深化的地方。作者对于新哲学的理论系统，也不是完全照抄外国著作的^[3]。”如果把《大众哲学》放到三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发展的水平上，可以看到，该书在以下几方面有着深刻的、独到的见解。

1) 突出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艾思奇详细论述了感性认识、理性认识的关系，特别是二者的“抬杠”矛盾，艾思奇反复强调，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有区别的，“感性中觉得是同一的，理性中偏偏看出了差别。感性中觉得有差别的理性中偏偏看出了同一”^[2]。新哲学即辩证法唯物论承认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这种矛盾，并认为两者“是永远要抬杠下去的，愈抬下去，认识就愈进步”^[3]。艾思奇还提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联系：“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分不开的。当我们认识一件事物的时候，首先是从感觉上得到一些直观。接着又才有理性的了解”。“具体事物是抽象法则的基础，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当我们应用理性去认识事物的时候同时还要能把握感性的基础^[3]。

2) 反复论证了实践对于认识过程的作用，在第三章认识论里，艾思奇对实践的定义和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作了简明的阐释。他指出，实践“就是改变环境的活动。只有在改变世界的活动中，才能够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密切地相接触，我们对于世界一切的认识是否真实，是否不落在空想里，才可能得到证明，得到矫正”。“只有在实践中可以得到最高的真理”^[2]。可见，艾思奇强调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他还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来源和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高于认识，“只有变革的实践，能够使人认识真理^[2]”是主观和客观的对立的统一，“只有它能使理论更接近客观的真理，我们要把实践看得比理论更高级”^[2]。

3) 强调哲学的重要问题在于能够改变世界。艾思奇在许多文章和《大众哲学》中一再强调：“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能够真正解决人类生活上、事实上的问题，哲学不能单只是说得好听的东西，还要能指导我们做事。它的重要的问题是在于要改变世界^[2]。”艾思

奇指出,决不能与实践脱离,哲学不是书斋里的东西。

“只有站在改变世界的立场上,在实践中磨练出来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最进步的哲学一定是代表着最进步的实践的立场,没有进步的立场,决不能得到进步的真理”^[2]。这里,艾思奇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起到了引导人们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作用。

4) 简明地概括了认识运动的总过程,列宁关于认识过程有段著名的论述:“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4]。”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发挥了列宁的论断,对认识运动的总公式作了概括,他说:“从感性认识到理论性,从理性到实践,又由实践得到新的感性,走向新的理性,这种过程是无穷地连续下去,循环下去,但循环一次,我们的认识也就愈丰富,所以这种循环,是螺旋式循环,而不是圆圈式的循环,它永远在发展、进步,决不会停滞在原来的圈子里^[2]。”

5) 《大众哲学》在认识论的结构上具有新颖的特色,它突出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认识和实践这两对矛盾。三十年代一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是只讲感觉到思维的认识过程,从感觉开始叙述,然后是表象、概念、判断、推理、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大众哲学》与这种结构不同。它在认识论部分除开头一节讲反映论,最后一节讲真理论外,中间三节都是讲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及实践的意义。在这当时是一种独特的贡献。

在三十年代的理论环境下,与同时期其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译著或专著比起来,《大众哲学》在以上几方面都具有简明、清晰、准确的特点。《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了进一步解释和发挥,这是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形式。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 1937 年 7、8 月间写作《实践论》、《矛盾论》,之前,曾读过《大众哲学》。1936 年 10 月 22 日,毛泽东写信给当时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指示:“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的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是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在一月初先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水平之用^[5]。”可见毛泽东较早的注意到了《大众哲学》,

并称《大众哲学》是“通俗的而又是有价值的”著作。可以推断毛泽东写作《实践论》时除了参考了西洛可夫、爱林堡著,李达、雷达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1936 年 1 月至 1937 年 4 月)和米丁主编、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与历史唯物论》(上册)(1937 年 7 月以前)等流行的哲学教科书以外,还参考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从《大众哲学》与《实践论》的某些内容的比较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例如毛泽东对认识过程的论述就与《大众哲学》很相似。《实践论》写道:“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6]。”艾思奇在后来修订《大众哲学》时,删去了关于认识发展总过程的论述,说明他可能是为了尊重毛泽东的创作才这样的。

艾思奇写作《大众哲学》时只有 23 岁。《大众哲学》的成功充分证实了艾思奇的哲学才华。但毕竟由于个人的认识水平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大众哲学》在写作手法和内容上不能不存在历史的局限性。最初版本的《大众哲学》的局限性表现在对绝对真理、相对真理的解释,对形式逻辑的态度上的不正确观点和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关系中“抬杠”、矛盾方面的强调及在各章部标题中把世界观与认识论、方法论分开列举,易使人误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功能等不妥当之处。在以后的版本中,这些缺点和不足得到了全面的纠正。但与《大众哲学》的贡献比起来,这些缺点、不足是瑕不掩瑜的。

2.4. 《大众哲学》的作用和意义

《大众哲学》通俗而简明地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为人们展示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开始时书名为《哲学讲话》。出至 3、4 版时,当时的当政者以“宣传唯物史观,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将此书查禁。后来,《哲学讲话》更名为《大众哲学》继续出版。短短两年内,《大众哲学》已出了 10 版,到 1948 年,已出了 32 版。可见其读者之众,影响之深远。

在国统区,这本书吸引了各阶层的民众,特别是

青年，指引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走上革命道路。有的人称《大众哲学》是一本“救命的书”，把他从极度的苦闷、想自杀了却一生的境界中挽救过来，看到了希望之光，毅然投身革命^[7]。《大众哲学》不仅为一般社会青年所欢迎，而且进入了大学校园，为大学生甚至教授学者所欢迎。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这本书在北大学生和西南联大学生甚至闻一多、朱自清等学者中间广为流传。起了不小的作用^[8]。《大众哲学》在抗日根据地和当时的解放区也广为流传，成为干部和战士学习哲学的入门书。著名诗人贺敬之在 40 年代写的一首诗中把《大众哲学》与《新华日报》、《解放周刊》和《活跃的肤施》并列，称之为“时代的火炬”，反映了这部著作的广泛影响。诗中写道：

“传递着，传递着，我们的“火炬”——！
我们的《新华日报》、我们的《大众哲学》，
我们的《解放周刊》，我们的《活跃的肤施》。”

《大众哲学》的巨大革命影响使当权者十分恼怒。据曾任国民党高级参谋，与蒋介石十分熟识，后来返回大陆的马壁教授讲，蒋介石曾对他的部下大发脾气：为什么共产党能写出《大众哲学》，而你们写不出来。马壁教授是 1984 年 8 月从台湾回到大陆的，现已去世，他曾专门拜访了艾思奇的夫人，并为艾思奇纪念馆题七言绝句一首：

“一卷雄书百万兵，
攻心为上胜攻城，
将军一败如山倒，
哲学犹输仰令名^[9]。”

刘白羽曾对《大众哲学》的社会影响作过精辟的概括。他说：“对《大众哲学》的评价，不能只限于它把哲学通俗化，而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把哲学推向人民中间去的一个重大突破。《大众哲学》点燃了无数人心灵的火花，引导无数人走上革命道路。正因为如此，艾思奇为哲学，同时也就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0]。”

《大众哲学》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它的巨大的革命的社会作用，而且还表现在这是哲学的通俗化的最早的，开拓性的著作。它为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开了先河。在它之后，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运动广泛开展起来了。继《大众哲学》之后，出现了一系列通俗读物。除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论》、《民族解放与哲学》

外，还有陈唯实的《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讲话》、《新哲学体系讲话》、沈志远的《现代哲学基本问题》，胡绳的“漫谈哲学”书信，《辩证唯物论入门》，李仲融的《辩证法唯物论》、平心的《新哲学读本》等。这些著作的出现标志着哲学通俗化已成为与文艺大众化、社会科学大众化并列的大众化运动。

《大众哲学》解放后仍有很大影响，不少读者纷纷给艾思奇写信，强烈要求继续出版《大众哲学》^[11]。但《大众哲学》仅在 1950 年出过一版，后来因陈伯达等人对艾思奇的嫉妒和仇恨为打击艾思奇，1953 年在学校内部组织了对艾思奇和《大众哲学》的围攻，使得这本书一直没能再版，直到粉碎“四人帮”才得以将最后修改的《大众哲学》再版出来。虽然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大众哲学》的内容已经不适合今天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了。但是它对哲学的解放仍是有重要意义的。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需要普及哲学，哲学为大众的方向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在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我们国家指导思想的今天，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以理服人，联系实际，要结合人们的思想状况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采取简单的、强制性的灌输的手段。只有向艾思奇学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坚定的信仰和准确、深刻的理解，掌握有强烈的使命感、时代感，与人民共呼吸，谱写新时期《大众哲学》新篇章。

3. 艾思奇提出和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项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外来的学说，它要在中国得到更广泛而深入的发展，就必须和中国的社会实际，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继哲学通俗化、大众化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就提到了哲学家面前。

据笔者至今所见的材料，艾思奇是最早公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人，《在哲学的现状与任务》一文中，他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口号(艾思奇提出这个口号是否与毛泽东有关，这是一个疑问)。艾思奇指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在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

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是不能够获得相当成果的，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另一方面，因为整个并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所以艾思奇认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2]。”这个运动以唯物辩证法哲学的研究为中心，吸取其他哲学派别的精华；它要“一切以抗战的实践为依归，而绝对排斥学院式的空洞的争论”^[2]。

艾思奇在其他文章中，进一步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含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的真精神即其基本原则，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问题上来，在我国的现实中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使之发展起来，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中国化，就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一般的正确性^[2]。”首先，马克思主义是正确地提示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特别是社会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理论，它的一般正确性在现实事物，在具体的国家和民族中间都有着特殊的表现形态。其次，马克思主义是引导人们客观地具体研究问题的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第三，马克思主义还是“资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策略，所以它有一般的正确性。这就是说凡是有了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运动的国家和民族，也就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2]。正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特点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

艾思奇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只能起引导的作用，而不能起教条的作用。……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文句和一切个别论点当作绝对不变的信条，无条件地搬到新的情况下来硬套”^[2]。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从事实发展的各方面的规律了发。这就是说，要学习从自己的工作环境的一切日常事实里，找出它的规律；依据这些规律来决定我们行动的方法”。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给我们以原则的指导和具体解决问题的范例。我们从马列主义的理论书籍里可以学习到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革命规律的知识。但倘若我们以此为满足，并把它简单地直接应用于中国革命的指导，而不看到中国社会的任何具体条件，那么这是离开了客观事物来解决问题，这不是辩证法唯物论，这

不是马列主义而是公式主义，是唯心论的一个种类”^[2]。艾思奇还打了形象的比喻说：“理论自然是真金子，你常洋洋得意，以为掌握了这些财富了，却不知什么时候，你的手里就只有一把毫无用处的粪土，这不是因为你得罪了五通神，而是因为你自己违背了实际精神^[2]。”他指出，理论只有和实际精神结合才能光耀耀闪光。

艾思奇还认为，在中国的实际条件下理解，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就是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解精通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而同时是指要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而“真正能理解精通……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正是有着‘创造’的作用了”^[2]。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完善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有着不同的表现。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将理论应用于实际，根据实践需要提出新的、正确的理论、观点、都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艾思奇指出，抗战以来已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实际应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泽东和朱德的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的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的历史收获”^[2]。另外，“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精神是指南，依据它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就有党的决定。党的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条件之下真正活的运用”^[2]。“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理论，抗日的持久战的规律知识，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的理论就是中国的党在全部马克思的宝库中增加进去许多新的东西”^[2]。

艾思奇批判了叶青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上所散布的错误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上所散布的错误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叶青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变更其形式，即把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丢掉。“有如一个新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不同”^[12]。艾思奇指出：“中国化决不是丢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相反地，愈更要能够中国化，就是指愈更能够正确地坚持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2]。”他揭露了叶青所谓“中国化”的反动本质，指出：“叶青所谓的中国化，在实际上是想要取消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是要反对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是要从战斗的中国人民的手中，夺取最锐利的科学思想武装^[2]。”

艾思奇曾指出：“哲学中国化，原则上不外两点：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教训^[2]。”对第一点他没有作更多的论述，从前介绍可见，艾思奇更多地是注重第二点，最早提及关于第一点的内容的是胡绳。他在1938年7月30日写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的小册子的《前记》中指出：“为了真正做到所谓辩证法唯物论的‘中国化’，‘在理论的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思想斗争’‘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必要的’^[13]。”但胡绳本人没有做到把中国传统哲学同唯物辩证法结合起来。抗战时期，侯外庐、赵纪彬、陈伯达等人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先秦、明清之际的哲学遗产，使其与唯物辩证法哲学联系起来方法做了不少工作。

综上所述，艾思奇提出、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不仅如此，他还努力做到这一点。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主观主义批语和对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研究上。

艾思奇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很有意义的，在他提出哲学中国化现实化问题后不久，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是作了科学的阐述。他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原文是‘中国化’——引者)。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我，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6]。”此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总是在理论界引起了普遍重视，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在今天，我们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结合起来，仍然需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地坚持、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当代中国正进行着一件伟大、光荣而艰巨的业绩的创造，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

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所以，“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也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都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真正高举”^[14]。

4. 艾思奇对主观主义的批评和对实事求是的宣传

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明确地反对了党内存在的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教条化、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倾向。着重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的重要性。整风运动对从思想上、政治上肃清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残余。在全党树立起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与统一起着重要的作用。整风运动是党建设的伟大创举，是我党历史上空前的具有深远意义思想解放运动。艾思奇在整风运动中，积极宣传整风运动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党提出的反对主观主义的总是作了全面系统的发挥。这些工作与他后来的《反对经验主义》一文在宣传，解释中央的整风精神，它们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进一步具体化和深化，是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做的贡献之一。

4.1. 艾思奇分析了主观主义的表现及其根源，论述了反对主观主义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把主观主义的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态度相对立，阐明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艾思奇发挥了毛泽东的思想，对反对主观主义问题作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

1) 艾思奇指出：“主观主义有两种基本形态，书本教条主义是一种主观主义，狭隘经验主义也是一种主观主义^[2]。”书本教条主义只注重书本知识，不喜欢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解决问题常常从书本上的空洞词句出发，而不是依据中国实际情况，具体应用马列主义的原则。狭隘经验主义夸大一时一地或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经验，把它当作中国革命全过程的普遍的东西。机械地运用于任何情况。艾思奇指出，这两种

主观主义常常互相渗透，教条主义不能完全浮在天空，而常常要从客观事实里割取个别现象，作为它的脚垫。狭隘经验主义也往往引用某些书本上的文句来装饰其固陋的见闻和壮大它的声势。

2) 艾思奇分析了主观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他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党支部内包含着大量的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员。教条主义的社会基础就在于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封建礼教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意识的影 响。“狭隘经验主义主要是农民的特点，他们的分散的、小生产的、小私有的生活，养成他们眼光短浅或狭隘意识^[2]”。从思想根源上说，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不可分的。“教条主义是夸大了片面的原理知识。狭隘的经验主义是夸大了片面实际知识，形态不同，而本质上是一样的”^[2]。艾思奇指出，真正的唯物论者必须摒弃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用辩证法的方法，对事物和总是作全面的观察和了解。

3) 艾思奇论述了反对主观主义的重要性。他指出，第一，主观主义是唯心论的，反对主观主义是为了防止我们犯唯心论的错误。唯物论与唯心论间没有隔着铜墙铁壁，只要在运用上略一歪曲，唯物论就可能变成唯心论。要能恰当地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就要谨防犯主观主义的错误。第二，主观主义是危险的，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害死人的”。中国革命斗争经验证明，主观主义不仅使理论的学习研究没有结果，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会招来很大的损失。因此，反对主观主义，学会在具体环境中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在延安时期，艾思奇着重强调了反对教条主义的重要性，因为整风运动重点反对的是教条主义。艾思奇反复强调，必须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一刻也不要忘记研究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一切发展规律，他指出：“为使理论更有效地指导中国革命。”我们须要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的具体条件的“道路上大大的努力，获取中国社会的更多方面的更具体的规律知识，……仅仅依据书本原理的主观臆测的言论，是应该停止的”^[2]。

4.2. 艾思奇对“实事求是”做了全面解释和发挥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把有的放矢地

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对“实事求是”概念作了明确的规定，指出“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从中找出固有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实事求是”是整风运动的一条基本原则。在学习，贯彻整风文件和精神的过程中，有些人把揭发事实等同于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认识和做法，艾思奇专门写了《不要误解“实事求是”》一文，对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概念作了充分的解释和发挥。他指出，仅仅简单罗列各式各样的事例，将工作中和生活中的缺点枝枝节节，零零碎碎地指摘出来，不能算是达到了“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的目的。辩证法唯物论者“不是要简单指出事实，而必须进一步应用理性的头脑，对事实加以理解；不是为事实而找事实，而必须从事实中求出所‘是’；不是单纯做调查工作，而必须把调查所得的材料加以分析研究”^[2]。

艾思奇具体解释了“实事求是”要领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他指出，“真正的实事求是，首先必须注意事实的各个方面，而不是只看片面。在指摘某一现象时，必须明了它在现象全体中所居的地位，而不是离开全体来孤立看待^[2]。”第二，真正的实事求是“必须从实质上来理解事实，而不应该只就表面现象来看事实或为形式的假象所迷惑^[2]。”艾思奇指出，有些事物实质上相同而表现形式不完全一致，有些事物表现形式相似而在实质上完全相反。所以要把实质和表现形式分开来认识。第三，看问题局限在某一方面，忘记了它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会使人们误解事实。所以，在研究事实时，不要只从表面的某些现象来类比和附会，而必须就每一事实的各个方面来做全面的具体的研究。因此，“真正的‘实事求是’，不仅仅在于理解事实和认识事实，而且要从这理解和认识中求得指导行动、推动工作的方法”^[2]。在这方面，艾思奇指出：“我们可以从毛泽东那里学习到最多的东西^[2]。”总之，真正的实事求是，就是依据上述原则对事实进行研究，以求对事实获得正确的理解。

4.3. 艾思奇解放战争时期对经验主义的批评

1942年以后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因为教

条主义是那时的主要危险，对经验主义的危害性则没有足够的估计和重视。解放战争时期，经验主义成为干部中一种危害极大的主要的思想方法。这是由于多年的游击战争和根据地被分割为许多独立单位的分散环境，使很多人的思想局限于狭小的工作范围，于从个别地方的条件、经验来考虑和解决问题，而不善于从革命全局的观点上来考虑问题、解决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在《关于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和中宣部重印的《左派幼稚病》的序言中，明确把反对经验主义提到了思想工作的首位来强调。艾思奇在《反对经验主义》一文中，对中央的号召作了详细的阐述。他分析了上述经验主义产生的根源，并指出，反对经验主义，不是否定一切实际革命工作经验的价值，问题不在于经验本身，而在于是否会分析、总结经验，找出关于事实发展和解决问题的规律知识。

艾思奇指出了经验主义的特点及其表现形式。经验主义“停止在分散的，零碎的经验圈子里，而不会把经验提到理论，来指导我们的革命斗争”^[2]。经验主义者常常眼光短浅，看不清事物变化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不能作有理论指导性的，有预见和有通盘计划的工作。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有三个表现。第一，仅满足于狭小工作范围内的局部经验，不虚心学习各方面的经验。第二，眼里充满各种分散的，零碎的经验，跟着不同的经验左右摇摆，不能对纷纭复杂的经验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总结。第三，对所获得的经验之正确与错误，不做任何分辨，只盲目地贮有经验。艾思奇指出，这种经验主义常常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必要补充。

艾思奇还指出了反对经验主义的方法。他说：“反对经验主义，就是要学习总结经验，把分散零碎的感性知识，提高到有综合性，条理性的理论知识^[2]。”这就要求，第一，总结、学习各方面的经验，倾听群众意见，学会用正确的指导方法如阶级分析方法、辩证法唯物论，对经验进行分析、研究。第二，分析各种保护层依据的主客观条件来决定正确的政策。在克服经验主义过程中，学会分析方法是至关重要的。艾思奇指出，只积累经验材料是不够的，要学习运用分析典型等方法发现事物的本质性，普遍性。

艾思奇还指出，为反对经验主义，领导干部要做

到利用各种可能，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特别是毛泽东的著作。后者“是我们学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之最好的模范”^[2]。第二，要认真研究党的纲领、路线、政策，反对借特殊之名，擅自修改中央或上级的政策。执行自以为是的错误政策的做法。第三，提倡在工作中“学习正确地调查研究，分析情况，分析经验，随时随地养成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的习惯”^[2]。总之，一切归结为学会分析的方法，这样才能真正克服经验主义。

艾思奇对经验主义的分析批判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但由于当时解放战争还在紧张进行之中，不可能像延安整风那样来消除党内严重存在的经验主义。1949年后，党又放过了对经验主义的批评，这是令人遗憾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反对主观主义。不仅要反对教条主义，还要反对经验主义。艾思奇对主观主义所作的分析和对“实事求是”所作的解释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补充和发挥，在当时的历史实践和理论上具有积极的、重要的意义。

以上材料说明：1949年前，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大众哲学》至今仍不失为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经典教材或范型。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括和捍卫，也值得今天的学者借鉴。而这一切都源于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度理解和信仰，他把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为此呕心沥血，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对此，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工作者，都应该心存敬意，并向他学习。

总之，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忠实探索者、实践者与开创者。他笃信力行，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说明中国的实际问题，完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特别是其《大众哲学》，奠定了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发展史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历程中的地位。今天重温这些贡献，对于当代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今天，纪念和研究艾思奇，最重要的就是付诸行动，切实做好理论联系当代

中国实际的工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提供创新性理论成果。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王笠夫. 艾思奇同志在申报流通图书馆[M]. 艾思奇文稿整理小组, 一个哲学家的道路.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77.
- [2] 艾思奇. 艾思奇文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 [3] 艾思奇. 大众哲学[M].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
- [4] 列宁. 哲学笔记[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181.
- [5] 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书信选集[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3: 80.
-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7.
- [7] 卢国英. 学者和战士[M]. 艾思奇文稿整理小组, 一个哲学家的道路.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238.
- [8] 黄树森等. 艾思奇同志与北京大学[M]. 艾思奇文稿整理小组, 一个哲学家的道路.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180.
- [9] 雷加. 大漠雷声——艾思奇印象散记附注[J]. 中国作家, 1986, 5: 208.
- [10] 刘白羽. 一个哲学家的道路序[M]. 艾思奇文稿整理小组, 一个哲学家的道路.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1.
- [11] 刘白羽. 一个哲学家的道路[M]. 艾思奇文稿整理小组, 一个哲学家的道路.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212.
- [12] 叶青. 论学术中国化[J]. 时代精神, 1939, 8: 5.
- [13] 胡绳. 辩证法唯物论入门[M]. 上海: 新知书店, 1938: 2.
- [1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165.